

11月17日上午，南京长江大桥。一个穿牛仔裤的小伙子在空中翻了好几圈，最后头朝下跌入江中，送到医院时已无呼吸心跳。这个过程被一位电视台的特约记者拍下，当天下午便出现在网络上，随即引来质疑，“为何有时间拍摄却不去救人”。

南京长江大桥上由来已久的自杀现象，伴随着一场新闻伦理之争，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一位曾经在大桥上自杀后获救的人士曾表示，在下落的过程中，感觉自己身体比一片树叶更轻。据不完全统计，南京长江大桥自1968年建成至今，累计有2000多人跳桥身亡。桥上有常年劝救自杀者的志愿者和警方组织的救助队，他们想伸手抓住每一片摇摇欲坠的“树叶”，可现实却比他们理想中的残酷许多。即便是设想中要安装的防护网，效果如何同样也不好说。凡此种种，都让人有强烈的无力感。

□快报记者 石磊 田雪亭



一名在大桥上准备轻生的女子，最终被大家劝了下来

资料图片



大桥生命守望者陈思已经救下198人，但他现在也经常被无力感包围

CFP图

在桥上 在生与死的边缘

“残酷视频”背后的轻生者，谁来帮他们留住生命的最后一步？

“残酷”的坠桥视频

让我们再回到11月17日上午的事故发生现场。当时，这个穿牛仔裤的小伙子站在大桥外沿，围观市民正在劝他不要做傻事，“太危险，不要这样子。”小伙子翻过栏杆说：“没事，给我一支烟抽抽。”有人立刻递上一支烟，他接过了烟。

大家看小伙子要烟抽，都以为他想开了。谁知过了一会，有人突然大呼，“他掉下去了！”事发突然，很多人都没看清，小伙子到底是跳下去的，还是不小心掉下去的。随后，小伙子从水里冒了出来，开始往岸边游。此时，路过的渔民将他拽上了船。但被送到医院时，他已经没有了心跳。

当天下午，小伙子坠江的视频就被挂到了网上，质疑声紧随而至，“拍摄者为什么有时间拍，却没时间救人？”据了解，这段视频的拍摄者张先生是电视台的一名特约记者。张先生解释说，自己刚跑到长江大桥南堡时，小伙子就坠入江中了。那时，他距离小伙子坠落的地点有150米。“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曾经和民警、市民一起救起过3个轻生者。遇到这种情况，我的第一反应是救人，第二才是记录。并不是我不想救人只顾着拍摄，而是离他实在太远。”

“你能体会到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在你面前消失的感觉吗？尤其当他开始求生，迎接他的却是死亡。”张先生说，公布这段视频，是想给后人一个警示，生命真的只有一次。

数量惊人的跳桥者

11月17日的悲剧，对于南京长江大桥来说并不算什么稀罕事。

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数字表，2003年至2004年两年间，共有234人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走上不归路。而被救下的自杀者平均每年有200名左右，2006年有近700名自杀者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一个被引用很多的数据是，南京长江大桥自1968年建成至今，累计有2000多人跳桥身亡。“到底有多少人跳桥，准确数字谁都说不清楚。”南京铁路公安处一位人士解释说，大桥既有铁路又有公路，涉及到的公安机关至少有六家。

这六家单位都有可能会接到或者参与跳桥者的警情和信息。快报记者单从铁路警方了解到，去年一年至少有150多人想跳桥，其中跳下去的有10人。今年截至目前，跳桥者数量有所下降，为100人左右，跳下去的为三四人。

“守望者”艰难支撑

“只要跳下去，死亡率基本百分之百。”于是，一些志愿者团队行动了起来，陈思是最著名的一个。2003年9月19日，他决定在周六周日上大桥救人，并租房开设“心灵驿站”，用于自杀者被救下后的心理辅导。

外界有传言“陈思支撑不下去，不干了”，他本人则否认了这个说法。陈思最近一次成功救人在11月7日。当日上午10点50分，他骑着助力车从大桥南堡往北堡巡逻。在离北堡100米正桥东侧，发现两个不超过20岁的女孩抱头痛哭，行李洒落一地。陈思连忙停下车询问，几个过路游客也帮忙拉住她们。

哭了一阵后，其中一个女孩说，她们是泗县人，在江北一个羽绒厂上班。干了半年活，厂里欠她们8000多元工资，两人想回家收稻子，可厂里非但不给钱，还将她们软禁起来。在逼迫之下，她们办好“互不相欠”的手续才出了厂门。“两个孩子没见过这种阵势，吓傻了，而且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想到了走绝路。我想把她们带回心灵驿站，但两个女孩死活不动，最后还是警察将她们带走了。”

2003年至今，陈思已成功救下198条生命，可他也不清楚自己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现在在一家物流公司工作，每个月2000多元收入。一家三口吃吃喝喝要用六七百元，剩下的钱我全花在了救人上。可现在‘心灵驿站’的房租已涨到一年8000元，如果最后连房租和助力车加油钱都交不起，我就只能停下来了。”

警察劝说效果有限

陈思只能勉强支撑，那么，警方都做了些什么？

2006年12月1日，江苏省公安厅与南京铁路公安处协调，成立了全国第一支由公安民警牵头和专司职救助工作的保安队员组成的“长江大桥轻生者救助队”。成立3年多来，救助队救助劝阻欲跳桥自杀者500人次。下关公安分局特巡警大队也有一个“达静爱心车组”，每年劝说和救助欲跳桥者三十多。

被救下的自杀者，派出所一般先将其领回，简单了解情况后，寻找家人将其领回，“但有一部分是找不到家人或者跳桥者不愿意说的，这就很难办。”警方表示，通常情况下，对于实在找不到家人的，他们只能将其送往救助站。但救助站是“自愿救助”，一旦当事人不愿意被救助，那只能让他们自行离开。

“牵扯大量警力，但效果并不是很好。”警方一位长期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士说，因为缺乏专业的心理疏导方式，很多情况下只能依靠民警的简单劝说，表面上看是暂时打消了跳桥者轻生的想法，但事实上是治标不治本。

一起画画如何？

后来，有人提出“用艺术来介入自杀心理干预的治疗”。

“当爱烟消云散，我剩下的只有忘情。”2008年1月6日下午，艺术家邱志杰在南京长江大桥拍摄浮雕，偶然发现了这行字——这是大桥轻生者割破手指头留下的。随后，邱志杰割破自己的手指，在墨迹旁边写下了一行新字，“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

“美国金门大桥上有位老警察，每当他发现轻生者准备跳桥时，就会冲对方来一句：‘哥们，明天你准备干什么？’”邱志杰说，“其实马达加斯加首都在哪里和那句话的效果差不多，可以把轻生者从悲观情绪中拔出来。”

邱志杰坦承，自己2008年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让被救下的轻生者画画。“我发现，有些人哭不出来，但我在旁边画长江大桥，一画他们就哭。”如今，他已经有了新的想法，“依旧是画画，不过相比以前更具科学性。”

“被救下来的轻生者，我会让他画一幅自己过河的画。”在邱志杰的设想中，自杀者被允许随意设置自己的过河场景——可以画一座桥走过去，也可以画一条船渡河，甚至可以画一只大鸟自己飞过河。“画桥过河的人会比较实际，画大鸟的则可能爱幻想，这些都有相应的标准。然后我和自杀者一起商量，慢慢修改他原先的过河场景。几次下来，他的情绪也许会有所缓和。”

装防护网行吗？

邱志杰的最新设想还没有实施，每年依旧有人走上南京长江大桥，或从高空坠江，或被人劝下。于是另一个办法出炉了——装防护网。11月17日的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这一建议被提及。

刘嘉等三位省人大代表说，平时经常能从新闻报道中看到有人到长江大桥跳江自杀，如果在大桥两边加一个防护网，就可以减少伤亡率。而且这并非没有先例，去年芜湖长江大桥两侧加装了一层防护网，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也在2008年10月决定安装防护网。“这样可能会增加养护费用，但我们认为是值得的。”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装防护

网，2006年，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志愿援助中心负责人张纯等人就提出设想：在长江大桥两侧装建由高强度尼龙绳织造的防护网。这样，即使轻生者纵身跳下，也会跌落在柔软的防护网上。“尽管防护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我们希望能给自杀者一次生还的机会。”

张纯有自己的理由，在众多到长江大桥结束生命的轻生者中，有一对特别的南通情侣。由于恋情遭到父母反对，他们先决定私奔，辗转到达南京后，身上的钱用光了，两人便决定跳桥殉情。双双站到桥外侧后，男孩告诉女孩，当他数到三时，就一起往下跳。真正数到“三”的时候，女孩跳了下去，男孩却迟疑了……“事后，男孩跪在女孩父母面前痛哭，如果当时就有防护网，这种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每个人都想抓住些什么

2004年，张纯第一次目击自杀者跳桥。他和几名大学生从长江大桥经过，发现一名男子站在桥外侧，没等人靠上去劝说就跳了下去。在即将钻进江水的一瞬间，轻生男子的手用力向上挥了一把，但没有抓到任何东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眼前总会出现一双绝望的眼睛。“其实在（轻生男子）坠落的过程中，我是看不到他表情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心理影响太大。”

在张纯看来，这名轻生者是想抓住一些东西，“可能最后时刻不想死了”。常年在长江大桥上参与救助的几支力量，和这名自杀者多少有些相似——每个人都想尽己所能抓住些什么，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陈思、邱志杰不约而同地把这归咎于无法逃避的社会现实。邱志杰认为，传统中国的纾缓机制似乎已经失效了，“从来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如此渴望成功，如此强迫自己成功，进而把自己变得短视。赚不到钱，找不到好工作，甚至追求异性失败，都可以成为自杀的理由。”

正如邱志杰所说，如今的城市已经成为界定成功与失败最残酷的舞台。1990年，陈思从宿迁来到南京挖土方，辛苦苦干了几个月，老板却卷了钱跑路，把他甩在南京的大街上。最后几个老乡相互帮忙，靠捡垃圾才勉强维持了下来。好在他最终打过来了，没有选择轻生。“媒体报道显示，大桥上总是外地人自杀的多，我心里有数，外地人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打击太大了，往往就会选择轻生。帮这些人留住最宝贵的生命，光靠我们肯定不行，”陈思说。